

杨倩如 / 编著

冉昭德



文存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冉昭德文存

杨倩如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冉昭德文存/杨倩如编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07-4923-5

I. ①冉… II. ①杨… III. ①冉昭德(1915~1939)—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0165 号

责任策划: 陈 珊

责任编辑: 陈 珊

封面设计: 牛 钧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7 印张 1 插页 4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山东大学是一所具有 110 余年辉煌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名校。20 世纪的山大校史上有两段人才辈出、成就斐然的高峰期，一是三十年代，一是五十年代，而冉昭德正是山大在第一个学术高峰期所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基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冉昭德在内的许多老一辈山东大学人的成就和贡献，并未引起今人的足够重视。为了更好地学习、总结众多前辈校友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充分彰显山东大学渊博精深的学术积淀和珍视传统的优良学风，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教授组织出版“山东大学校友研究”系列丛书。而《冉昭德文存》作为该丛书的第一部纳入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现予推出。

序

黄留珠

冉昭德先生是我十分尊敬和景仰的前辈学者。

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读大二时,看到《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的冉先生《论刘邦的阶级出身》一文。先生精辟的分析、恰当的定位,令我钦佩不已。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文中关于刘邦出身“中家”地主的结论,并始终坚信其论证的正确性。后不久,我们开设的历史文选课改用新出版的《汉书选》为教材,而该教材的主编,正好就是我心向往之的西北大学冉先生及另一位我极其敬佩的陈直先生。当时给我们上文选课的是魏应麒先生。魏先生学识渊博,功底深厚,解放前就已是著名教授,出版有《中国史学史》、《林文忠公年谱》等多部著作。如此一流的教材、一流的教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我日后选秦汉史为专业,应该说与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而在此过程中,我与冉先生的学术情分可以说也更近了一步。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当我踏入西北大学之时,冉先生已经作古多年,故而没能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这,着实令我抱憾终生!

现在的高校工作,重头戏大都是提升本校的级别(争“211”、进“985”之类)、申请项目资金、评比、申报奖项、申报院士、申报重点学科等等具体事务,很少有人关注已经逝去的老先生。加之现今的用人,诚如汉臣汲黯批评汉武帝那样:有如“积薪”,是“后来居上”。如此,“冉昭德”这样一位 1941 年便任教于西北大学的老先生之名,在西大已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年轻一代,似乎早已不知其为何许人也。不过,对于一位在学术史上曾留下深刻印迹的学人来说,研究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把他挖掘出来并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果然,以“汉书学”研究为旨趣的杨倩如博士将其学术目光定格于冉先生身上。她以极大的热

情、顽强的精神收集、整理冉先生的遗作，走访冉先生的同事、好友、学生、亲属等。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杨女士写出了多篇研究冉先生学术成就与生平事迹的论文。如今呈奉给各位读者的这册四十余万言的《冉昭德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应该说就是杨博士整理冉先生著述、研究冉先生学术活动的集大成之作。该《文存》由上、中、下三编正文，以及前言、附录、后记等组成。正文上编收录冉先生学术论文26篇，中编为冉先生自1959年3月至1960年9月的日记，下编是亲友书信及回忆录。前言介绍冉先生的生平与学术，附录载有冉先生学术年谱等资料，后记则记述编者本人与冉先生的学术“交往”。通过它，冉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这样讲，冉先生又重新复活了！

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就人事隶属关系而言，冉先生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的研究成果却并非某一单位的私有财产，而属于全社会和全人类。所以看待冉先生，不可限于一个院校，也不可囿于一个地区，而需要用全中国的眼光，甚至是世界的眼光。由此而论，杨情如博士所做的工作，显然是意义深远而功德无量的。

衷心感谢王学典教授及山东大学出版社！他们慧眼识珠，慷慨施以援手，最终解决了《文存》出版的难题。说起这一点，我是深感惭愧的。原来，杨君情如编好《文存》后，最先来找我希望寻求西大给予出版资助。按理说，冉先生是西大老资格的教授、著名学者，西大为他出一册纪念文集，可谓天经地义、言正名顺，同时也责无旁贷。然而大家都知道，西大是所省属穷校，一点有限的蛋糕，在职人员尚远不够分配，哪里还能顾及一个离去多年的逝者！再说，我在西大只是一介普通教师，且已经退休多年，尽管自己非常愿意为《文存》出版效力，但实际情况却是一筹莫展。适逢陕西省文史馆长安学研究中心推出“长安学丛书”，其中有一个系列名曰“长安学者文集”，是专门为在陕工作过的著名学者设立的，倒与拟筹办的《文存》出版一事有所契合。而我在这个中心还有点话语权，于是遂将全部希望寄托到这里。不想事有不巧，此事因文史馆与参事室两机构的合并而搁置。后长安学研究中心又从文史馆剥离，挂靠至其他单位变作国际长安学研究院。这样，《文存》出版的事便陷入一种无着落的境地。正当我焦急而无奈之际，杨博士打来电话，告知《文存》在王学典教授的关心之下即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好消息。闻讯后首先是高兴，因为《文存》出版的事终于得到落实；但在高兴之余，却也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应该说，这里有太多的遗憾，也有

相当的愧疚。

不过转念一想,倒觉得《文存》最终在冉先生的母校山东大学出版,应该说是一个更佳的选择。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非人力所能扭转。冉先生 30 多岁便离开山东家乡,远赴祖国西北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在这里,他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聪明才智乃至生命。到头来,他的《文存》又回到家乡出版。这无疑是一个“轮回”——尽管这个“轮回”有如彭卫教授所言充满了“历史的荒诞”,但其毕竟具有着明显的“魂归来兮”、“落叶归根”的意义。如果冉先生地下有知,我想他老人家是会感到慰藉的。

值此《冉昭德文存》付梓之际,应编者杨倩如博士之嘱,写了上面的一些话,是为序。

2014 年 6 月 23 日 10 时
草讫于西北大学桃园区铸音阁

冉昭德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研究(代前言)

杨倩如

一、冉昭德先生生平概况

冉昭德(1906~1969年),字晋叔,祖籍山东省成武县^①。他生于清末一个书香世家,先祖为孔子的高徒冉求^②。少年至青年时代,冉昭德在菏泽、济南、青岛等地求学。1926年自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1929年与同学臧克家^③、王先进^④一道,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补习班,次年进入国立青岛大

① 成武素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城武县志》:“汉高祖过鲁,祀孔子。以武功告成,改楚邱为成武。”又云:“明初尚宝铸印,误加土为城。”1958年复改为成武县,今属山东省菏泽市辖。

② 冉求,亦名冉有,字子有,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冉氏子弟共有十多人师事孔子,其中冉求、冉耕、冉雍、冉孺、冉季等皆品行出众、学术成就突出,至今菏泽地区仍有冉府、冉林、冉庙。冉氏家族因世代业儒、从政,与孔氏家族和其他儒学世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冉姓各堂长门曾多次随孔、孟、曾、颜几大家族被历代统治者册封,至清乾隆帝赐予孔姓及曾、颜、孟、冉各家族三十辈辈分(后四家辈分低于孔姓),并赐世袭五经博士、翰林学士。清代所赐冉姓辈分排行为:希言公彦承,宏文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凡祥,令德惟纯佑,钦绍念显扬。冉昭德是第十六代“昭”字辈。

③ 臧克家(1905~2004年),山东诸城人,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1929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预科,是冉昭德的大学同窗兼生前好友之一。

④ 王先进(1906~1995年),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执教于河南大学、曲阜师范学院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先进是冉昭德的同学兼室友,是其生前好友之一。有关冉昭德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多出自王先进回忆录《古稀之年忆母校》、《我校的优良传统》、《回忆吾师闻一多先生》等。(详见山东大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峥嵘岁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学文学院学习。^①

创建于1901年的国立青岛大学,素以风气醇厚、治学谨严和思想活跃闻名于世。冉昭德进入青岛大学文学院攻读之际,正值祖籍山东蓬莱的教育家杨振声出任校长。杨校长年届不惑,奋发有为,学校所聘教授皆为一时之选:如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是著名爱国学者闻一多,游国恩、黄淬伯、杨筠如、方令孺等知名学者亦在此执教。闻一多主持文学院的工作,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他以精彩、幽默、智慧、勇于创新的教学,勤奋、严谨、公允、爱护人才的作风,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然而,由于闻先生生性耿直、思想开放、特立独行,遭到了少数思想保守的学生的反对和一些教职员别有用心的排挤;更有一些人蓄意煽动学生闹学潮,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企图压制师生思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②校长迫于压力,将其解聘。^③当时冉昭德等一批有正义感的学生都非常支持、同情闻先生,为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在闻先生离校前一晚,冉昭德与同学王先进、臧克家、李桂生、许星园一起去他家中送行。有同学因之前反对过闻先生,特意为自己的冒昧行为向闻先生道歉。而闻先生对自身遭遇丝毫不以为意,且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学生抱以宽容之心,认为学生出于年幼无知,有些误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质,成为冉昭德一生为人、治学的榜样。

冉昭德求学之时,正值军阀混战至国民党专政时期,国家衰败,政治黑暗,民

① 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成立于1929年10月。1929年5月,奉教育部令,国立山东大学改称“国立青岛大学”,由杜光坝、蔡元培、杨振声、傅斯年等九人组成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10月,筹委会设文理两科补习班,招收合乎投考大学一年级资格的学生,分别补习国文、外文及数理等主要科目。据王先进回忆,考入青岛大学补习班时,臧克家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冉昭德是第三名。补习班对于学生的要求很高,无论月考、期考,凡有两门副课、一门主课不及格者,一律勒令退学。结束补习班学习之后,他们三人又一同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学习。

② 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后爆发过数次学潮:第一次在1930年开学初,学校开除用假文凭报考的学生而引发学潮。第二次是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各地响应,青岛大学学生也罢课,学生强占火车开往南京。当时局势非常混乱,闻一多站在学校的立场,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遂遭到学生围攻。第三次是在1932年6月,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而罢课。其时学生指责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新月派包办青大”,打出批判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更有甚者,在黑板上画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遭到这样的打击,闻一多在1932年夏被迫离开青岛。

③ 据王先进《回忆吾师闻一多先生》记载,当时一些人组织学生在校墙上贴标语,声言要“打倒把持校务的闻一多”,还到校长杨振声的宿舍楼前请愿。杨校长不同意这样胡闹,请学生代表去协商,他们又贴出“打倒校长杨振声”的标语。当时正值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将新任校长段锡朋打伤,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解散中央大学之际,行政院见到青岛大学也闹学潮,遂下令解散,任命杨振声为整理校务委员会负责人。对所有学生进行甄别,全体教员亦一律解聘,不再接到聘书者就须自动离职。杨振声迫于压力,不得已将闻一多解聘。

不聊生。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先生爱国之情激荡于胸，执着追求报国之路。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进入山东之际，他就参加了号召爱国师生加入北伐军的宣传、组织工作。他时刻企盼着国家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当政后，国家、民族的前途仍是风雨飘摇，暗无天日。在菏泽六中读书期间，冉昭德与王先进、田位东结为好友。田位东是中共早期在山东的领导成员之一，1929年因领导、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与冉、王二人接触频繁。^①据王先进回忆，1930年田位东出狱后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为避人耳目，就住在国立青岛大学他和冉昭德的宿舍里。冉昭德丝毫没有担心自己受到牵连，而是一再叮嘱田、王二人要注意安全，并善意地提醒他们小心提防同宿舍另外两位已加入国民党的同学。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于好友所从事的工作却抱以同情和支持，这种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人生态度始终贯穿于他的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青岛大学广大教职工与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全校所有男生都报名参加了政府号召的军训，准备参战报国（军事教官即为日后在缅甸殉国的抗日名将戴安澜），冉昭德也跻身其中。之前他曾申请自费赴日留学并获批准，但最终由于家庭原因放弃赴日，转而发愤读书，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以求服务社会。他在求学期间刻苦钻研学业，在闻一多指导下，完成小说、论文多篇。其小说经闻先生的热心推荐，发表于《东方杂志》（上海）。此外，在校方的大力倡导之下，他和臧克家、许星园、李桂生创办了《励学》杂志，并发表论文《蔡邕评传》（1933年）和《〈文选〉中惨死的作家》（1934年），从此步入学术研究之途。

1934年大学毕业后，冉先生先后在山东惠民乡村师范学校和济南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随山东联合中学、湖北中学、国立六中辗转流亡于河南南阳、安徽砀山、湖北郢阳和四川绵阳等地，并于1937年冬赴西安考察汉长安都城、宫殿遗址，搜集西京史地文献和考古资料。其后，他在四川三台地区参加了教育部

^① 田位东（1906～1932年），原名田秩，字位东。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城关三里庄，1922年夏考入菏泽六中。1926年因领导废除“三禁”校令的罢课学潮，被取消入学资格。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29年7月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1930年8月获释。出狱后接受党组织委派，到青岛担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1931年3月，他在枣庄煤矿秘密建立中共枣庄矿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枣庄矿区特委，并担任书记。1932年7月，他作为主要领导之一，组织数千煤矿工人进行“七月大罢工”，并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由于工贼出卖，田位东和部分工人代表于7月22日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与资本家的软硬兼施，他坚守信仰、威武不屈，于8月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年仅26岁。

组织的教育服务团。1941年,经陆懋德教授推荐^①,他来到当时暂居于陕南城固县的国立西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通史”。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随校迁往西安。

20世纪4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是冉昭德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他先后在《史董》、《文史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汉西京宫殿图考》(1940年)、《水碓小史》(1941年)和《汉上林苑宫观考》(1946年)等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并在《中央日报》和《申报·文史副刊》上,与翦伯赞、吕思勉、胡适等人开展学术争鸣,研究内容涉及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通史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②

新中国成立后,冉昭德继续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爆发前,冉先生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在组织、领导中国史教学和科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长年于浩瀚的史料中辛勤耕耘,自觉钻研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指导教学与科研实践,由此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他先后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光明日报》、《陕西日报》、《西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体现出他深厚的史学功底,也是他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结晶。在秦汉史研究方面,他率先开设了相关课程,在诸如“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形成专著——《秦汉史》(手稿于“文革”中被毁)。此外,他还参加了多项由西北大学历史系承担的国家重点学术项目,如标点《汉书》、编选高校文科教材《汉书选》等工作。概言之,在二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冉先生对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冉昭德先生为人忠厚、诚恳,治学勤奋、严谨。他一向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研究情况,赢得了众多学生的尊敬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兼任任教于蓬莱中学,为留居西安的鲁籍青年创造学习

① 陆懋德(1885~?),别号咏沂,字用仪,山东历城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1911年8月作为清廷的第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获文学学士及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37年起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师专教授及系主任等职,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考古学、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其著作《中国上古史》于1941年获“民国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陆懋德国学蕴藏深厚,蜚声学界,与冉昭德交往甚善,是冉先生生平敬仰的师友之一。

② 详见冉昭德:《评吕、翦两先生的〈秦汉史〉》,《中央日报》1948年1月8日;《评翦伯赞著〈中国史纲〉》,《中央日报》1948年1月29日;《读〈群书治要〉里的〈晋书〉》,《申报·文史副刊》1948年5月29日。

条件。^①平时他也十分关心社会青年的成长、进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历史基础知识，鼓励青年们自学成才。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精湛的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更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不幸于1969年5月14日含冤去世，终年64岁。

回顾冉昭德先生的一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政治上，他对于党和国家无限忠诚，积极要求进步，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信仰。在学术上，他终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育，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仍坚守一名史学工作者的勇气、良知与信念。1978年，冉先生的冤案终获平反昭雪，其生平事迹与学术贡献得到了校方与学界的肯定，先后被载入《西大学人谱》（1991年）、《共和国奠基人名录（陕西卷）》（1992年）和《陕西历史学年鉴（1949—1989）》（1992年）。

二、冉昭德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积极、进步的思想追求，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治学风格，使冉昭德先生获得了广博精深的文史知识与专业素养。作为“国内仅有的公认的秦汉史专家”^②，他的“学术成就自成一家之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③。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研究，在秦汉制度史、社会史、思想史领域多有建树，尤其在《汉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概言之，冉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汉代都城、宫殿的研究，对中国古代饮食史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

（一）汉代都城、宫殿研究

汉代国力强盛，西京长安的都城、宫殿筑就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吸引了古今中外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考证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以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出土、研究手段的日益先进，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惜若仅就20世纪前半期而

^① 据刘书琴回忆录《蓬莱中学的兴衰》，蓬莱中学成立于1943年，是旅陕鲁人为纪念祖籍山东蓬莱县的爱国人士吴佩孚坚贞不屈、拒降日寇的高尚节操所建，属山东同乡会所有。初建于陕西省周至县，抗战胜利后迁至西安市北关（今新城区向荣巷小学附近）。当时学校财政困难，依靠冉昭德等一批鲁籍学者兼任任教，以及教师义卖书画维持。在此义举感召下，一些商家纷纷伸出援手，蓬莱中学得以扩大规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略有盈余。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学校与其他中学合并。

^② 林剑鸣：《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③ 彭树智主编：《陕西历史学年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论,对长安都城、宫殿进行系统研究且卓有建树者,除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外^①,中国学者的成果却相当罕见。其时正处于旧中国考古事业的起步阶段,虽然一些有志之士已开始了有组织的考察,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②,但由于当时战乱迭兴、政局动荡,所取得的进展亦十分有限。在这一背景下,冉昭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成的两篇论文——《汉西京宫殿图考》和《汉上林苑宫观考》,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1937年冬,冉昭德赴西安考察。鉴于“通记历代都邑者,自郑樵《都邑略》以来,至顾炎武之《历代帝王宅京考》,地理之形势较详,宫殿构造,尚无系统之叙述”^③,且前人史籍“皆详于地理,疏略史事,宫馆苑囿,著录盖寡;藉考制度之因革,文物之兴替,尚感缺如也。窃不自揆,爰以治史余暇,兼及历代宫殿之研究”^④,遂萌生了撰写汉代西京都城、宫殿考证专著的念头。其时正值日寇侵华,全面抗战爆发,冉先生随学校辗转流亡,生活动荡、困窘之际,仍心系此项研究,于1939年末撰成《汉西京宫殿图考》两卷。上卷专述西京宫殿,刊发于《史董》1940年第1期;下卷专述离宫别馆,以《汉上林苑宫观考》为名发表于《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3号。

关于该文的写作情况,冉先生曾自述道:“时身在西蜀,困于典籍,求假不易,曾手钞《三辅黄图》六卷。”1941冬,他进入国立西北大学工作后,“始以友好之助,得读程大昌《雍录》、宋敏求《长安志》、李好问《长安志图》、毕沅《关中胜迹图志》等,展校旧稿,更正无几”,“迄今五载,稿凡三易”^⑤,至1944年正式定稿。新中国成立后冉先生曾想继续推进此项研究,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实现。^⑥

冉昭德有关汉代西京都城、宫殿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史料翔实,考订精审。据笔者统计,《汉西京宫殿图考》两卷总计48000

① 足立喜六(1871~1949年),20世纪初开展长安史迹考古的日本学者。1906~1910年,他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撰成《长安史迹考》一书,配有照片171张和插图38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详见[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② 20世纪前期中国学界对于长安遗址较大规模的考察计有以下数次:1933~1934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由徐炳昶领导,对汉、唐两京遗址进行了调查;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王子云率领,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调查;1942~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劳幹、夏鼐、阎文儒等领导,先后两次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调查。

③ 冉昭德:《汉西京宫殿图考·自序》,《史董》1940年第1期。

④ 冉昭德:《汉上林苑宫观考·小序》,《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3号。

⑤ 冉昭德:《汉上林苑宫观考·小序》,《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3号。

⑥ 据1957年刊发的《西北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现状》记载,冉昭德曾提出要在来年将这两篇旧作改写为《汉西京宫殿与上林苑》一文。但在笔者所搜集到的冉昭德论文目录中,却未见到此文。推测或是出于某些原因未能完成,或是手稿被毁于“文革”抄家之时。

余字，其中注释近 8000 字，约占全文的 1/5，引用文献逾 60 种。^① 作者在古今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细心考证，广泛搜求，博采众家之长而多有创见。在此仅以“细柳观”为例加以说明。他首先说明：“细柳，即秦之柳中也……为汉代屯兵之所。昔周亚夫次细柳以备胡，文帝劳军之细柳，不得驰驱，乃按辔徐行至中营，后世传为美谈。”细柳的具体位置在何处？自古说法不一，总结起来共有三种：一是郭璞注《上林赋》曰：“细柳，观名，在昆明池南。”《汉书·文帝纪》张揖注从之。二是《三辅黄图》曰：“细柳观在长安西北。”《西京赋》薛综注从之。三是《三辅旧事》和《文帝纪》如淳注：“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冉昭德详细辨别了上述三家之说，征引《汉书·匈奴传》、《西京赋》和《续汉书·郡国志》中张揖、郭璞之说以及沈约的《乐游苑饯吕僧珍诗》，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上林赋》中既然明言“登龙台，掩细柳”，说明龙台与细柳两地相近。龙台在鄠县东 30 里，按《郡国志》之说，则细柳观应在鄠县昆明池之间，即长安西南郊，是周亚夫所屯处也。同时他还指出，在渭北石徼者有汉之“细柳仓”，但并非周亚夫屯军的“细柳营”，因此《三辅黄图》、《三辅旧事》、《三辅故事》、《读史方輿记要》以及薛综、如淳之说俱非。他的考证严谨，言之有据，结论令人信服。^②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史学典籍的搜集、爬梳之外，注重文学作品的征引、利用。作者眼光独到地注意到了汉赋的史料价值：“汉赋之学，浮夸之士，好其章句，以余揣陋，窃好其宫殿之好，文物之盛矣。”故而他考证都城、宫殿时，“篇内取材，虽以《汉书》、《黄图》为主，宫殿方位，实多征信于汉赋”。因为汉赋的作者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缘当代文人，身历目睹，记载翔实，远胜后之耳食。如神光宫，《黄图》失载，幸存于《羽猎赋》；宣曲宫，《黄图》谓起于宣帝，名则见于《上林赋》”^③。他在《汉西京宫殿图考》上卷中，开篇即高屋建瓴地指出长安的“山川形胜，班张两赋言之详矣”，遂以班固《西都赋》与张衡《西京赋》为基础制成一张图表，“表列于左，以省辞费”^④，

① 该文引用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词、赋 15 篇，包括屈原《九歌》、阮籍《咏怀》、沈约《乐游苑饯吕僧珍诗》、李白《忆秦娥》、杜甫《秋兴》，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和《长门赋》，扬雄《羽猎赋》、冯衍《显志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潘岳《西征赋》、卫瓘注《吴都赋》、繁钦《建章凤章赋序》等，以及《文选》、《文苑英华》两部文献；引用历史典籍与考据文献 46 种，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续汉书》、《宋书》、《西京杂记》、《汉武故事》、《古今注》、《三辅黄图》、《关辅古语》、《汉旧仪》、《三辅旧事》、《三辅决录》、《汉官阙疏》、《汉官阁记》、《汉官职典》、《宫阙簿》、《西汉会要》、《考工记》、《金石索》、《水经注》、《春秋合诚图》、《通鉴》、《读史方輿记要》、《蚕茧室》、《雍录》、《长安志》、《长安志图》、《关中记》、《关中胜迹图志》、《初学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广韵》、《三秦记》、《玉海》、《庙记》、《图书集成》、《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记集解》、《汉书补注》、《清一统志》、《两京新纪》、《拾遗记》，以及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等。

② 冉昭德：《汉上林苑宫观考》，《东方杂志》1946 年第 42 卷第 13 号。

③ 此段引文均出自《汉西京宫殿图考·自序》，《史董》1940 年第 1 期。

再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长安的历史沿革、地理结构与山川形胜,令读者了然于胸。

其次,将历史、地理研究与制度因革、文物兴替的考察相结合。如“昆明池”条,短短一段,仅485个字,将涉及“昆明池”的诗歌、辞赋、史籍、图表一一包罗,将武帝“穿斯池以习水战”,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后的重大史事——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以及复平西南夷后置武都、牂柯、越隼、汶山四郡——相结合,发出了“千载之下,池水虽涸,犹令人想见汉武之雄才大略,威扬南裔,岂可与鹿台迷楼比论哉”的感慨。^①文辞优美,考订精审,读来意蕴深长,耐人寻味,堪称文史并美的佳作。

再次,“以文献、考古的资料来进行‘两重论证’,力图恢复汉西京的宫室建筑制度”^②。西北大学素以高水准的考古和史学研究著称,陈直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实现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由于时代、资料 and 整体研究水平的限制,冉昭德虽未能像王国维、陈直及当代学者那样以全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从事秦汉史研究,但在进行西京都城、宫殿的研究时,已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典籍的搜集、梳理与文物考证、实地勘察相结合。在写作中,他努力克服“有关西京史料,均无从搜访。更无暇瓦当之参证,遗址之实测”以及“行囊屡空,生活维艰,心有余而力不逮”的困难,尽可能地搜集当时的地图及瓦当等出土文物^③,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故有学者提出,应将冉昭德的研究视作汉长安城遗址早期考古的重要成果,予以重新评价,笔者深以为是。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和当时众多与国家民族同患难、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冉昭德先生对汉代西京都城、宫殿的研究,是在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感召下所进行的。研究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激发民众与学界巨大爱国热情和强烈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冉先生指出,通过对汉代都城、宫殿的研究,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政治民生、文章俊异均可一一考见,可使读者“慨然想见吾国周秦汉唐之盛”,同仇敌忾,以“俟岛夷之灭”^④。虽然该文写作距今已七十余年,冉先生的一片慷慨壮烈之心、忧国忧民之情,仍跃然纸上,历历可感。

① 冉昭德:《汉上林苑宫观考》“昆明池”条,《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3号。

② 刘士莪:《历史的真实——缅怀令人敬仰的先师冉昭德先生》,见本书下编。

③ 《汉西京宫殿图考》附录地图六幅:1.汉长安形势图;2.汉长安故城图;3.西京诸宫方位图;4.长乐宫图;5.未央宫图;6.建章宫图。瓦当图案十种:1.方春蕃明;2.亿年无疆;3.长乐未央;4.长乐万岁;5.长生无极;6.万岁;7.千秋万岁;8.延年益寿;9.凤寿存当;10.骀荡万年。

④ 冉昭德:《汉西京宫殿图考·自序》,《史董》1940年第1期。

综上所述，冉昭德对于汉代长安都城、宫殿遗址的考证、研究，内容翔实全面，考证严谨周密，是20世纪早期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这两篇创作于抗战时期、长达4万余字的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身后，均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汉西京宫殿图考》一文未公开发行，早年刊行的石印本多已散佚；二是由于冉先生的早逝，使后人对其学术研究情况不甚了解。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高峰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长安作为这一伟大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具有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①当前，学界已将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保护与开发、利用，视为推动长安区域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此可知，此项研究具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与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然而，当前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研究的均为考古学工作者，主要关注20世纪中后期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成果，对于20世纪前期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因此笔者以为，如能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百余年来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的发展历程，将20世纪前期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汉长安城考古的奠基阶段，总结其成就，比较其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异同，必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成果——冉昭德先生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之一。

（二）中国古代饮食史研究

关于中国饮食方面的历史研究，是一件极端复杂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它不仅反映着中国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实质，而且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尤其是中国膳食的制作方法，是祖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菜肴既已闻名全世界，我们各种各样的饭食，也有向外介绍、交流的 necessity。因此，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确有进一步开展的需要。”^②

此段极富哲理的论述，是冉昭德进行中国古代饮食史研究的起源与目的。

饮食生活史是一个隶属于社会史的边缘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11~1949年是“兴起阶段”，以1911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

① 主要成果包括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汉长安城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196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② 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书的出版为开端,此后三十余年间相继出现了十余种相关论著。在1949~1979年的三十年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饮食史研究基本处于“缓慢发展”的“停滞阶段”,出现的成果屈指可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此项研究方始进入“繁荣阶段”,迄今为止已出版了数百种相关论著。

由此可知,冉昭德先生有关古代饮食史的研究成果,在此项研究的兴起与停滞阶段,是相当引人注目的。^①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1941年末,冉先生撰写的《水碓小史》发表于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第12期。文章详细考察了水碓的起源,指出“汉人已用碓舂”,且“水碓之兴,至晚不得迟于东汉”;此后经曹魏至晋,水碓成为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之一,“晋朝士大夫,藉以致富者,太有人在”。冉先生结合黄河流域的主食——麦饭与饼食,考证出当时文献中所谓“水碓”、“水碓”、“水碓”均谓“水磨”,由此得出结论:“北方士民,既习于面食,而晋之水碓,又多在洛阳河南一带,此亦水碓为水磨之旁证也。有斯二证,余故曰水碓之名,晋人亦兼指水磨而言。未若后世以舂粟曰碓,制面曰磨之区别也。”该文发表后,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水碓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我们哪里可以不知道一点它的来历?”“希望大家读了可以从日常生活里认识历史,这是培养历史兴趣的最有效的方法。”^②

新中国成立后,冉先生的古代饮食史研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著作,他逐渐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方法。1956年他撰成《西汉时期水磨考》一文,次年发表时更名为《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该文一经刊发,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③不仅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肯定,经日本刊物转载后,获得了日本学者的推崇。他去世多年之后,仍有日本学者来信询问此项研究的进展情况。^④

在这篇图文并茂、详尽系统的论文中(文后附有11幅图),作者在全面考察

① 参见徐吉军、姚伟钧:《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3期。

② 详见《文史杂志》1941年第12期刊物末页顾颉刚撰写的“编者按”。

③ 在笔者采访冉昭德的同事、学生的过程中,虽然时隔多年,大家对于冉先生这篇论文均表示印象深刻,认为极富学术价值。例如,原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彭树智教授高度评价了冉先生这种从微观入手、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认为此文“以小见大,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的独特视角对自己日后从事学术工作启发很大。(详见后文彭树智访谈录《冉昭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④ 肖沙在《执着追求进步的著名学者——冉昭德》一文中,称被介绍到日本的论文是冉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西汉时期水磨考》,但未说明该文出处。笔者多方查找该文,却一无所获。《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刊发的《西北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动态》中提及“冉昭德副教授正写一篇‘中国磨的发展’的文章”,随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即发表了《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一文。因此,笔者推测冉先生被介绍到日本去的论文应是这一篇。